

河东记札

55年前的晋南沿黄四县乡镇调整

□吴晓征

1971年,三线建设的战鼓响彻大西北、大西南,黄河流域的晋南大地,也悄然掀起一场行政区划的“大拆大合”。运城临猗、万荣、河津和临汾乡,晋南4个沿黄河而居的县域,在那一年行政区划调整中,被重新“剪裁缝合”。8个公社(乡镇)易主,数十万人的归属悄然改变,也为4县后来的经济发展埋下了伏笔。

一

1970年,山西省撤销晋南专区,恢复运城地区、临汾地区。此前,晋南地区涵盖今运城、临汾两市,面积大、人口多、管理跨度长。拆分后,运城地区辖13县,临汾地区辖14县,管理半径缩短,效率提升。这为1971年的县域调整铺平了道路。

1971年,全国三线建设进入高潮。山西作为华北战略纵深,被赋予“能源保供+军工配套”双重任务。中央要求,县城功能专业化,资源向重点县集中,管理要高效直达。当时的晋南,农业县与山区县交错,不少公社与县城隔着河流、大山,管理成本极高。比如,乡宁县的下化公社,地处吕梁南麓深山区,距县城上百里,而河津县城离下化只有几十里。这种“行政隶属与实际地缘严重错位”的现象,在1971年的调整中被集中解决。

区划调整,往往不是在纸上画线条那么简单,它蕴含着治理智慧和经济发展诸多考量。在沿黄4县乡镇调整中,这种功能定位清晰可见。

临猗的定位是“山西粮仓”。万荣县西南角的孙吉公社、南赵公社,紧邻黄河东岸,是典型的滩区沃土。这里地势平坦、水利条件好,是万荣县的“粮仓”。1971年,这两个公社被整体划入临猗县。临猗县由临晋、猗氏两县合并而成,

本就平原农业见长,孙吉、南赵划入后,进一步巩固了“晋南粮仓”的地位。

而河津南边的通化公社、里望公社,土地平展,面积广袤,与万荣县城地缘相近、方言相同、姻亲往来频繁。1971年,这两个公社被划入万荣县。

通化公社辖14个村,以通化村为中心,该村历史上曾是隋代大儒王通故里(“通化”之名即源于此)。里望公社辖15个村,地处台塬地带,土厚水深,适宜种植小麦、棉花。划入万荣后,通化、里望与万荣腹地连成一片,行政隶属与地缘习惯终于统一。万荣县虽然失去了孙吉、南赵两个富庶公社,但补进了同样优质的通化、里望,面积、人口、耕地基本持平,农业县的基本盘稳稳守住。

下化公社建制从乡宁划入河津,这是1971年调整中最为关键的一步,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步。

下化公社原属乡宁县,地处吕梁南麓,山大沟深,煤炭储量丰富。但这个公社距离乡宁县城极远,交通极为不便,干部去县里开会要翻山越岭走两天;村民办事,往往就近去河津。而河津县城距离下化只有三四十里,沿河谷而下,半天即可到达。1971年,下化公社建制划入河津,包含9个行政村:老窑头、周家湾、上化、陈家岭、杜家湾、上岭、南桑峪、半坡、下院。

下化的价值在于煤、铁、硫磺。吕梁南麓是山西重要的能源带,下化的煤炭储量可观,硫铁矿更是工业原料。河津获得下化,等于拿到了通往能源工业的“钥匙”。

二

1971年,沿河4县乡镇大调整,为县域经济发展划定了明确边界,也为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临猗划入孙吉、南赵,不是为了扩大地盘,而是为了整合黄河滩区最优质的耕地,形成连片的粮棉基地,事实证明这一目标已经实现。近年来,临猗已成为山西最大的水果生产基地,苹果出口东南亚,“临猗苹果”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

万荣通过“平账置换”,保持了稳定与繁荣。万荣在调整中“丢了两块、补了两块”,背后深意在于,通化、里望与万荣地缘更近,管理更顺,减少了飞地和插花地带来的行政纠纷。

河津从农业县,迈向了能源工业县。河津是1971年调整中战略意图最明确的一个。划出通化、里望两个农业公社,换入下化这个煤炭山区,是产业转型的关键一跃。河津地处汾河谷地,平原面积本就不多,即使保留通化、里望,也难以在做大做强农业上有所突破。而划入下化后,煤炭资源成为河津的未来,河津后来才能发展出煤、电、铝、焦、化、钢铁、铸造等重工业。

今天回头看,河津是这场调整的最大受益者。下化的煤炭支撑了河津几十年的工业发展,河津铝、焦、钢、化等企业崛起,一度成为运城地区唯一入围“全国百强县”的县市。

三

行政区划调整,不只是地图上的线条移动,更是文化归属的调整和无数家庭的命运转折。

著名将领傅作义是孙吉镇安昌村人,原属荣河县,后并入万荣县,区划调整后又归属临猗县。而王通、王绩、王勃、薛瑄等历史文化名人,史书上一直记载为河津人。区划调整后,他们的家乡通化、里望划归万荣县。

生活方面的变化更为具体。据孙吉公社的老人们回忆,1971年春天,县里干



▲河津下化南桑峪新景(资料图)

部来村里开会,说“咱们要划给临猗了”。村民起初觉得,地还是那块地,庄稼还是那些庄稼,只是换个县名而已。但很快,变化来了:供销社的货物从万荣调拨改为临猗调拨,学校的试卷从万荣印刷厂改到临猗印刷厂,连赶集时用的秤砣上,“万荣县衡器厂”的字样都慢慢消失了。

最微妙的是通化、里望。虽然划过去已55年,但这两地村民的心里依然有河津情结。在他们口中,“去城里”指的是去河津县城,去万荣县城则说“去解店”。

下化公社划归河津后,最直观的变化是路。河津为了开发煤炭资源,很快修通了从县城去下化的公路,除了209国道到老窑头外,龙虎路、九一路、九龙路、上固路、铝厂上山路、老下路、府峪路等相继建成,境内公路四通八达。近年来,更是村村通上了水泥路。几十年后,下化成了河津最富裕的乡镇之一,当地村民开着小汽车回村,村口停满了“晋M”牌照的车。

沿黄4县乡镇调整,是特殊年代的产物,战备逻辑、资源整合、管理效率,三条线交织在一起,在地图上画出了新的边界。

文化茶座

方言里的乡土标识

□薛丽娟

回乡采访,恰逢春日晴和,正是民间常说的“二八月乱穿衣”时节。我一时贪暖,外套穿得略厚,路上走着走着,额头渐渐冒出汗水。

身旁相谈的一位老者看在眼里,笑着抛过来一句地道乡音:“你这是lin下的?”

我一听便懂,笑着点头,明白他的意思,是说我舍不得脱衣,硬扛着。儿时,见人拘谨,不知道手脚哪里放,母亲总爱笑着调侃一句:“我这娃是lin下的。”意思是娃像借来的,放不开、生分得很,戏谑里藏着疼爱。这句方言土语,我听得懂,却不明白“lin”是哪个字。

聊起这话,老者告诉我,这个“lin”,就是租赁的“赁”。老人家是打趣我,这身衣服跟租来的似的,舍不得脱下,非要多穿一会儿才觉得值当、划算,才算不白费那份“租金”。一句朴素的玩笑,既点出了我穿得厚重的窘态,又透着几分亲切风趣,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。短短一句“赁下的”乡土口语,装着一方水土的生活机灵与人情温热,让远行在外的人,一下子便接住了故乡的温柔。

说起万荣方言,里头的趣味着实不少。心里发愁、遇事一般,叫作“熬煎”“心挖挠”,仿佛把人心放在火上煎烤一般;在心窝挖了一块,格外形象;过日子节俭仔细,便说“细法”,精打细算、手巧细致的模样跃然纸上;没事坐一起拉家常、聊闲话,叫作“漏闲”,还带着几分吹牛调侃的意味。还有一个“挣”字,更是万荣人的灵魂写照——认死理、爱抬杠、喜较真、性子犟,却又偏偏不服输,一个字就把当地人的脾性写活了。这些生活化的说法、比方,把日常小事说得活灵活现,看似随口而出,实则包含着当地人过日子的通透与处世的豁达。

方言朴实接地气,却藏着大雅,内里蕴含着生活智慧,是一方水土重要的文化标识与记忆,值得搜集、细品。

河东风物

王官别墅的廉政文化



▲王官别墅(资料图)

□孙可心

在永济中条山麓王官峪畔,有一座大院,既非商贾巨富的宅邸,也非主人亲自督造的居所,却以其独特的姿态,成为山西大院文化中一道另类的风景——这便是王官别墅,又名阎敬铭别墅。

王官别墅有一层“子承父志”的深沉底色。它并非阎敬铭本人所建,而是其子阎迺竹遵父命,于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起造,历时10年方成。待院落落成、匾额高悬之时,那位一生清廉的老人,早已在数年前病逝。于是,这座别墅便成了一座特殊的“遗作”——它没

有等来主人的亲临,却处处烙印着主人未竟的精神追求。

阎敬铭(1817年~1892年),陕西朝邑人,晚清著名理财家,有“救时宰相”“布衣宰相”之称。他一生历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四朝,官至东阁大学士、户部尚书,掌管大清财政多年。彼时,清王朝已走向没落,官场腐败成风,阎敬铭却刚正不阿,精校财赋,剔除中饱,将混乱的财政整理得井井有条。他主张“治以节用为本”,因谏阻慈禧修葺圆明园而被革职留任。

别墅整体风格自然朴实,下窑窑洞,上载院落,既融合了北方院落的严谨布局,又兼具园林的雅致意趣。其选址考究,坐北朝南,通过砖券窑洞抬升二层院落地平,既保证了通风采光、视野开阔,又减少了雨涝灾害的侵扰。这种建筑方式,是建立在对拱券结构受力充分认识之上的智慧结晶,体现了当时建筑工艺的精湛水平。

这座别墅最珍贵的,并非其建筑本身,而是那些镌刻于门楣、石柱之上的匾额与楹联。它们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珍品,更是阎敬铭人生态、价值观最直接的体现。

正门楹联上书:“处物要吃亏,立身要吃苦;治生不求富,读书不求官。”迎宾门上的一小篆楹联则境界更高:“勿认富贵为功名,更化功

名成道德;欲安身心主忠信,力行忠信出才能。”这既是对子孙后辈的谆谆教诲,也是对世人的警醒。

这些楹联,字字珠玑,句句箴言,是阎敬铭一生“质朴,以廉洁自矫厉”的真实写照。即便在致仕归里之后,他仍聚徒讲学,扶桑兴农,教化民众,以“老成谋国,瞻言百里”的赤诚,继续影响着乡里。

行走在这座院落之间,品读着那些历经百年风雨依然清晰可辨的楹联文字,不禁让人思忖:一座未能等来主人的别墅,一位未曾亲临其境的老人,却以这样一种方式,将他的精神追求永久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

这些文字所承载的,是一种超越时空的价值追问——在功名与富贵面前,一个人应当坚守什么?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,安身立命的根基又在哪?阎敬铭用他的一生给出了答案:真正的功名不在富贵,而在于道德修养;真正的才能源自忠信,而非权谋机巧。“处物要吃亏、立身要吃苦”的坚守,“勿认富贵为功名”的清醒,以及“力行忠信出才能”的务实,穿越百余年时光,依然能给予今人以深刻的启迪。

本版责编 王捷
美编 李鹏 校对 薛丽娟
E-mail:ycwbwh@126.com